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中国当代生态文明观体系构建*

——基于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解析

蓝庆新 彭一然

【摘要】生态文明建设是现阶段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选择。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离不开对生态文明理论的系统研究,需要进行理论阐释。文章基于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通过生态文明观的体系的构建,从生态文明哲学观、历史观、经济观、政治观、文化观、社会观角度对当代中国生态文明进行阐释,试图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人与自然关系 生态文明观 体系

【作者】蓝庆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彭一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

随着工业文明的深入发展,生态危机不断出现,工业文明在解决生态问题上的无力状态日益暴露,世界各国已普遍接受并致力于建设生态文明,中国更是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并列成“五位一体”总体战略布局,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十八大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行动纲领写入党章;十八届三中全会进而提出要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要求为保护生态环境和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严格的法律制度保障;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作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理念,成为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性认识的最新成果。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改善生态环境,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离不开对生态文明理论的系统研究,需要有扎实的理论加以阐释和指导。

* 本研究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杰出青年学者项目《我国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发展策略研究》(15JQ02)阶段性成果。

生态文明的相关研究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国外学者对生态文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1)生态社会主义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环境问题的加剧,发达国家绿色运动逐渐兴起。一些左翼学者提出生态社会主义观点,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认为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必须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未来社会应是人类文明史上质的变革,是采用生态经济模式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而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实现生态经济的根本保证(戴维·佩柏,1993;John Bellamy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2000)。(2)生态现代化研究。与生态社会主义相对应的是生态现代化研究,研究者更多地从私有产权和市场机制角度研究生态与经济的关系,提出通过生态现代化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案。他们认为,包含了生产链、技术体系和经济部门变化的现代科学与技术生态诱导性转型中至关重要,私有经济主体和市场机制在生态重建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政府部门逐渐转变为可协商的规则制定者(Huber, 2004; Pataki, 2009)。(3)全球环境治理研究。基于环境问题的弥散性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生态问题逐渐演变为一种全球性问题。许多学者开始研究全球环境治理和生态民主问题。他们认为,环境治理是一整套管理程序和组织,政治和经济关系、制度体现、国际协定、国家政策和立法以及地方决策结构、跨国机构和环境非政府组织都是需要考量的对象;全球化环境治理可以打破传统国家界限,除了主权国家之间的环境谈判,还要通过引入新的组织及互动方式进行跨国环境治理行动,以影响政府环境决策过程(Morrison, 1995; Dryzek 等, 2011)。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在以有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关注生态文明研究,相关研究集中在生态文明定义、形成背景、发展意义,理论来源、发展实践、建设策略等方面,学者们分别从哲学、经济和政治视角对生态文明进行了理论内涵研究(曾正德, 2011; 牛文浩, 2013; 黄娟、汪宗田, 2014; 沙占华, 2015)。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高消耗、高污染的风险社会,生态环境治理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关键阶段,生态文明建设尤为必要。在中国生态文明发展实践中,仍存在着对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关系认识不足、利益至上的资本逻辑、片面粗放式的增长方式、注重经济增长忽视环境治理、唯GDP论的增长理念、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念、生态保护尚未成为全民的行动自觉等问题,高增长、高消耗、高污染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改变,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因此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为基础,从以下几个方面阐释当代中国特色生态文明观,从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政府决策和生态社会转型与治理提供参考。

二、生态文明哲学观

生态文明哲学观主要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的本源。一方面,人类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人类出现之前,自然界就已经客观存在,并按照自身规律运行。另一方面,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前提和基础,为人类的生存、延续和发展提供必要的生活资料、物质资料和能源资源。“没有自然界,

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①人类的思想意识形成于与自然界紧密联系的实践过程中,其精神活动也依托于自然而进行,“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另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②因此,人作为自然界组成部分的客观地位决定其不应成为自然的征服者和统治者,而应与自然和平共处。人的生存过程是通过劳动实践不断实现与自然之间物质、能量和信息变换的过程。“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化的过程。”^③人的出现使自然界由独立于人之外存在的客观物质世界转变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客体,其价值借助人的实践活动实现并通过人类文明的进步成果表现。但是,人与自然在实践过程中的主客体关系并不意味着人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而是在于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为其一定的实践目的服务。只有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生态文明成果。

综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生态文明哲学观是指人在改造自然过程中尊重、爱护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共同进化、协调发展,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以代替工业文明中人与自然相互对峙、分离割裂的关系。

三、生态文明历史观

生态文明历史观主要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阶段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认为,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生态文明既是历史问题又是发展问题。“人类对自然界的特定关系,是受社会形态制约的,反过来也是一样,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④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关系。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3种形态。原始文明时代,生产力水平极低,人类最主要的生产活动是采集和渔猎,对自然的认识和利用能力有限,消极被动地适应自然,依附并受制于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建立在不了解自然、畏惧自然基础上的低层次平衡融合关系。农业文明时代,随着技术发展,采集和渔猎为种植和驯养所取代,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增强,从消极被动转变为积极能动适应自然,利用自身力量实现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局部影响和改造,甚至为了满足生存需要而破坏自然;但由于人类的生产活动以农牧业为主、活动范围有限,这种破坏总体上未超出生态系统承载力,人与自然仍相对和谐。到以大机器生产为标志的工业文明时代,社会生产力从根本上提高,人与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20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页。

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人类改造和改变自然的能力大大提升,形成了以主宰和支配自然为核心理念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一方面将自然视为满足人类需要的无尽资源库,任意索取,另一方面将自然视为天然垃圾场,肆意排放废弃物,甚至逐步超出自然的调节与再生能力,导致人与自然的的关系日益紧张,自然灾害和生态危机频发。工业文明已无法解决人与自然的对抗冲突,需要一种更高级的文明形态来修复人与自然的的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否定之否定定律,生态文明是对人类传统文明的整合、重塑与升华,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人类对当代生态危机进行反思之后的必然选择,具有时代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当代生态危机具有全球性特征,中国的环境状况更不容乐观。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虽然给中国带来了长足的发展,但也激化了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环境问题愈加严峻。人均资源不足,耕地、淡水、森林、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人均拥有储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造成能源资源大量消耗,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日益突出,资源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刚性约束加剧。中国更是亟需建立跨越工业文明、破解资源危机和生态困境、再现人与自然关系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同时,随着发达国家进入到后工业化社会阶段,对生态重视度不断加强,向生态文明客观发展的趋势凸显,而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也积累了雄厚物质基础,使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四、生态文明经济观

生态文明经济观研究生态文明中经济活动与生态理念、经济发展与自然保护的辩证统一,探讨集约化、绿色化、生态化的经济模式。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会阻碍生态保护,而生态保护会提高经济发展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经济发展,两者是对立的关系。另一方面,在一定的条件下,经济发展可以为生态保护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而生态保护带来的环境改善将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物质生产资料,有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是生态文明经济观的两种模式。经济生态化是将生态理念融入经济发展,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尊重自然规律、保护和爱护自然,保证人与自然物质交换的正常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变换理论指出,“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过程。”^①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得以通过贯穿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活动的人类劳动实践体现和完成,经历了由农业经济低水平顺畅状态向工业经济扭曲与断裂状态的演化。这种扭曲和断裂状态引发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冲突,主要源于工业化进程中通过控制和剥夺自然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因此,人与自然之间正常物质变换的回归、经济与生态平衡的实现要求经济活动模式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208页。

转变。经济生态化要求探索集约化、绿色化的新经济发展模式,破解人与自然物质交换破坏的问题,遵循减消耗、再回收、再利用的原则,实现物质循环发展,谋求以最小的环境资源成本实现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体现了对自然的尊重与保护。人类不再一味向自然索取,而是主动将其对资源的需求限制在资源环境承载阈限内,以期降低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促使人与自然之间正常物质变换的回归,促进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和谐统一。这符合马克思主义“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①的物质变换破坏解决途径和“生产废料再转为同一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②的废弃物再利用模式,也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③相一致。

生态经济化将生态资源的生态功能和经济价值并重,生态资源应按照经济规律被赋予相应的价值,通过价格机制对其进行配置、流通和使用,这是由其外部性和稀缺性决定的。生态资源如空气、水源等具有公共物品性质,其使用和消费不具排他性,存在负外部性。例如,在环境容量充足的情况下,废水废气等污染物可以得到及时处理消化,生态经济化并无必要;在环境容量稀缺的情况下,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排污者争相排放污染物,超出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将产生巨大的负外部性,生态经济化就很有必要。生态经济化可以通过生态资源资产化、生态资产资本化和生态服务有偿化实现。生态资源资产化是指通过明晰所有权使生态资源转化为能给所有者带来效益的生态资产的过程,生态资源转化为资产后应按照经济规律对其开发利用、保护、恢复、再生、增值、积累等生产、再生产环节进行投入产出管理;生态资产资本化是生态资产,通过直接利用、间接利用、使用权交易、产业化等方式转化为生态资本,产生未来现金流,调动生态投资的积极性,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保证生态产品的足额供给,以经济效益带动生态资产保护,以开发生态资产收益反哺生态建设的过程;生态服务有偿化以生态服务提供者收费、生态服务消费者付费为特点,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将生态服务向价值最大化、最稀缺的地方配置,政府通过生态补偿制度对市场机制失灵予以调节补充,促进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协调、高效、持续运行。

生态文明经济观强调人类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坚决摒弃通过控制和剥夺自然的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关注集约化、绿色化和生态资源合理配置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经济生态化与生态经济化的统一,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统一。

五、生态文明政治观

生态文明政治观研究生态文明的执政理念、制度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协调,探讨从国家战略高度应对生态危机的制度模式。马克思主义不赞成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中“先污染后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5页。

③《习近平谈生态文明》,人民网,2014年8月29日。

治理”的模式,强调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应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突出政府的责任与作用。一方面,政府应进行科学的生态规划与管理;另一方面,政府应完善各项环境法律法规,鼓励资源的循环利用,将对环境的破坏和消极影响降至最低。马克思曾指出工业污染在资本主义社会下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进一步扩散,除与资本主义本质相关外,与政府放任自流的态度不无关系,政府应承担重要的责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政治观要求积极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执政理念转变和制度建设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主要表现为生态文明执政理念、生态制度建设、生态行政建设。

生态文明执政理念要求将生态文明思想融入执政理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将生态文明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用科学规划指导生态文明建设。正确政绩观的树立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实现,要转变“唯 GDP 论英雄”的执政理念,将生态环境状况和发展质量效益引入政绩考核机制,构建科学合理的绿色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引导绿色发展,实现生态文明。“十八大”将生态文明上升到国家治理理念和战略高度,确立成为重要的执政理念之一,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①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②,其中,绿色化是新增要素。这体现了中国政府在执政理念上的转变与进展,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重要体现。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具有长期性、战略性、持续性的系统工程,必须依靠科学规划的指导,应在严格执行国土空间、资源环境生态规划基础上编制生态文明建设规划。

生态制度建设是生态文明政治观的另一重要体现。制度具有根本性、权威性和硬约束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③生态文明政治观要求将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等环节纳入制度建设,使生态环境保护有章可循,例如,以资源管理和节约为核心目标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用途管制制度、资源集约使用制度等,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目标的资源有偿使用和污染防治制度、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等,以增强生态服务功能为核心目标的生态补偿制度和以规范优化国土空间为目标的国土空间开发和保护制度等,强化制度约束。同时要求加强生态文明法制建设,制定、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进自然资源综合立法,使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有法可依。

① 《习近平谈生态文明》,人民网,2014 年 8 月 29 日。

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人民日报》,2015 年 5 月 6 日。

③ 习近平:《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人民网,2015 年 8 月 5 日。

生态文明政治观要求生态行政的建设,反对传统行政系统中的“非生态化”和“反生态化”,要求行政的生态化。行政主体应在履行行政职能的过程中自觉遵循自然规律,维持生态平衡,推进生态型政府的建立。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建立责任追究制度,主要对领导干部的责任追究。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①,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

六、生态文明文化观

生态文明文化观研究生态文明中民众生态思想和意识的内化性,探讨先进文化、行为自觉与生态文明的融合性。生态文明文化观是人们对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深层次认识,是一种和谐发展的思维方式,以生态价值观、生态伦理观及由此衍生的生态意识为核心内容。生态文明文化观为促进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实现生态文明提供精神和智力支持。

人类是一种意识性动物,其活动会在一定价值观念的支配下进行。传统工业文明形成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将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物质财富增加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作为判断人类行为是否合理的价值标准,只要人类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其对自然任何方式的索取均是合理的。虽然人类在征服自然方面取得了胜利,但最终不仅生态危机频发、自然价值遭受损害,人类的长远需要也没能得到满足。因此,应摒弃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强调人类价值的同时,承认自然在人类生存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树立与生态文明相一致的生态价值观。生态伦理观充分肯定自然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内在价值,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价值取向。马克思的生态伦理思想基于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的辩证统一关系,人负有保护生态的责任与义务。人类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自然属性是基本属性,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其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自然界,因而其行为受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制约。社会属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属性,人类社会在人类能动改造自然的劳动实践中形成,人类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还是社会存在物。生态伦理观以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相统一为基本道德原则评价、规范人的行为,从而达到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目的。作为自然存在物,人类应遵守自然规律;作为社会存在物,人类应在能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承担保护自然的责任,将判断行为是非、善恶的道德标准扩展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凡是符合两种属性相统一、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的行为就判断为善的行为。生态价值观使善恶标准逐渐转化为人的内在约束力,实现其对行为的自我约束,从而引导人类走上人与自然和谐之路。

生态价值观是生态文明文化观的基础,生态伦理观是导向。两者的树立有利于绿色消费观、绿色科技观等生态意识和理念的形成,生态意识和理念是两者的具体表现形式。随着

^① 习近平:《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人民网,2015年8月5日。

生态价值观、生态伦理观日趋成熟,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价值取向、以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终极关怀的生态意识逐渐觉醒,并演化为一种文化,内化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之中。在这种文化的引导下,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成为人类的责任和行为规范,最终形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行动自觉。

七、生态文明社会观

生态文明社会观研究生态文明的和谐社会形态,以及该社会形态下社会结构、秩序、关系和法则。生态文明社会观将生态问题上升为社会问题,强调解决生态问题要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础,升华到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涉及包括社会结构、秩序、关系等在内的各种社会因素,通过社会全方位改造,形成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和谐社会形态。生态文明的和谐社会是对传统工业社会的反思,其内涵不仅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更体现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社会的关系构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人们在生产中不仅影响自然界,而且相互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①生态文明社会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置于社会关系中进行考察的观点,人与自然产生冲突矛盾的根源在于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和谐,和谐社会形态下的社会结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

生态和谐社会形态下的社会结构是经济、社会、自然协调发展的整体性和全面性结构。生态结构在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是社会系统的一个特定层次结构,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基础性地位。生态结构与整个社会结构之间存在上向和下向因果链关系。从上向因果链关系看,生态结构对于保持社会整体结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生态结构缺位或与社会结构中其他要素之间的不均衡关系会影响经济发展及社会和谐,激发社会矛盾与社会危机,并最终演变为社会变革的动力。从下向因果链关系看,社会结构会影响和限制生态结构,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就会有相应的生态结构与之适应。在人类社会的发展演进中,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变革不断影响和推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从原始社会的被动顺从自然到农业社会的能动改造自然,再到工业社会的征服自然。因此,若想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要通过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变革优化社会结构,形成经济、社会、自然协调发展的社会结构,从而走向生态文明。

生态和谐社会下的社会秩序具有公平性。社会秩序是指实现改造自然实践的一定组织形式,本质上是人与人关系的规范化与制度化。社会秩序的公平性体现在改造自然过程中的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代际公平是指当代人的生产发展方式和资源利用方式不应损害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页。

代人的生态利益。代内公平包含区域公平和人际公平两种含义,是资源在不同区域和社会群体之间公平合理配置。现实中,资源在区域之间的分布、不同社会群体对资源的可获得程度和不同区域、社会群体开发资源的能力往往呈现非均衡特征,导致不同区域和社会群体在资源实际占有上的不公平,从而引发经济社会的不平衡发展,成为影响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因素。

生态和谐社会形态下的社会关系体现为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人与群体及区域社会之间友善、融洽、和睦的关系。社会公平是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保证,而人际关系和谐是保持社会稳定、有序、繁荣发展状态的基础。社会关系和谐的根本在于人际利益关系的和谐,即社会成员在合理性基础上对社会发展成果和代价的最大程度的共享状态或关系。人际利益关系的和谐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社会成员在公平分享生态资源利用收益的同时,公平承担由此引致的环境成本与代价。如果一部分人或群体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顾资源开发的生态成本,并将相应的生态代价甚至危机转嫁给他人和社会,将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生态资源的日益稀缺与人需求的无限膨胀必然激化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陷入恶性循环,引发生态危机和社会问题。因此,公平和谐的社会关系对实现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应当在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基础上,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观为目标和引领,以历史观为依据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树立生态文明经济观、政治观、文化观和社会观。努力构建集约化、绿色化、生态化的经济模式,促进生态保护和协调的执政理念和制度体系建设,提高人民生态文明意识,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以公平、协调、共享为原则推动生态和谐社会的发展,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参考文献:

1. 戴维·佩柏(1993):《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
2. 黄娟、汪宗田(2014):《美丽中国梦及其实现——兼论生态文明建设:道路、理论与制度的统一》,《理论月刊》,第2期。
3. 牛文浩(2013):《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基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视角》,南开大学博士论文。
4. 沙占华(2015):《生态文明建设:机遇、风险与机制构建》,《理论月刊》,第12期。
5.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2000):《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6. 曾正德(2011):《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本质、地位与形态阐释》,《南京社会科学》,第5期。
7. Dryzek J.S. and Stevenson H.(2011): Global Democracy and Earth System Governance. *Ecological Economics*.
8. Pataki G.(2009):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s a Paradigm of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9. Huber J.(2004): New Technologies and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10. Morrison R.(1995): Ecological Democracy. Boston: South End Press.

(责任编辑:朱 犁)